

7.102

重庆文史资料

第四十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四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A43/36

主 编 徐朝鉴

副主编 李宗杰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四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重庆市嘉陵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0

字数 181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一版 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621—0842—0/K·43

定价: 3.00 元

目 录

回忆重庆的对私改造	徐伯图 (1)
重庆裕华纺织厂的公私合营	许崇汉 (32)
重建重庆金融的一段史实 白银彰 杜万春 谷昆山	(40)
解放初期接管建行的片段	邓林春 (45)
西南区行随军入川记	沈至潜 (50)
组建西南区行的一段历史	张茂甫 (55)
从童工到科学家	於福海 (58)
纺织工业家苏汰余事略	张钧陶 (72)
爱国实业家康心之	祝允丰 (84)
同生福钱庄与汤子敬	谷昆山 (92)
刘鸿生与中国毛纺厂	吕 奎 (99)
木竹工艺师宋雨田	龙正中 (111)
峥嵘岁月 光荣历程	
——记国营西南车辆制造厂	彭文仁 周桂森 (115)
三线建设与重庆机械工业的发展	高湘泽 (134)

“三叶”座座布江河	刘定福 (139)
为军工生产配套服务的重庆地方机械工业	刘贵福 (145)
前进中的重庆通用机器厂	刘名忠 (150)
从荆州到渝州	赵清善 (155)
艰苦奋斗在异国 ——对伊拉克劳务输出的回忆	许伯强 (169)
重庆木船运输盛衰纪略	黄定淮 (180)
利昌猪鬃厂杂忆	蓝德尊 (186)
解放前重庆的货币与金融	蒋孟豪 (191)
重庆银钱业中的“比期”	赵世厚 蒋孟豪 (200)
兼营汇兑业务的“麻乡约”	刘光玉 (207)
重庆金融界的一次浩劫	刘光玉 (214)
重庆最先建立交易市场实行统一发票	江礼华 (218)
《重庆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至四十辑目录索引	(219)

回忆重庆的对私改造

徐伯图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0月下旬解放军进军神速，未经重大战役就解放了重庆，国民党除在渣滓洞屠杀几百革命先烈外，原准备爆破重庆的罪恶计划来不及实施。因此解放时，重庆工矿企业破坏不大，又由于解放军纪律严明，不骚扰市民，解放后的重庆人民人心安定，时局比较稳定。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重庆工商界人士时有往还，因此工商界对中共的和平改造政策有所了解；又由于重庆解放较晚，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工商界与重庆工商界有一些联系，并知道中共对工商界的政策，因此，当时重庆工商界对解放军进城持欢迎态度。解放时，工商界原商会理事长温少鹤以及范众渠等还到海棠溪去迎接解放军。解放军进城以后，成立了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政府机关，并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其时，党和人民政府抓了两项大事：一是为稳定社会秩序，对蒋介石遗留下来的特务及散兵游勇进行了两次大逮捕，抓了几千人，稳定了时局；二是为稳定金融，发行一次胜利折实公债，使市场经济得以稳定。因而在重庆解放后，重庆的工厂、商店纷纷开门营业、开工生产、逐渐恢复正常。

1950年1月23日召开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作的《为建设人民的生

产的新重庆而斗争》报告中指出：“在重庆进一步建立革命秩序，保卫治安，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以渐渐康复起来的人民重庆，来支援即将完成的解放战争，协助农村土改，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重庆生产建设。”当时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有五六十人参加了会议，我也在其中。大家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有了明确的了解，受到很深的教育。

1950年1月，曹荻秋副市长约我谈话，他说，为了稳定物价，必须稳定金融。现在决定发行一次胜利折实公债，成立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由他任主任委员，胡子昂副市长任副主任委员，安排李仲平为推销处处长，新华日报记者纪希晨为宣传处处长，徐伯图为秘书处处长。当即在解放碑现重庆百货公司楼上开始办公。胜利折实公债计划发行300万公分。当时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银圆券大量贬值，形同废纸，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也很不稳定，未取得工商界的信任。采取折实公债每公分折合当时一块银圆，以能够买几升米、几斤面粉、几尺布、几斤煤炭的价值作为一个公分，将来还本的时候按当时几升米、几斤面粉、几尺布、几斤煤炭的价值归还，主要推销对象为工商界。由于当时工商界在国民党崩溃时，为了保值起见，大多数收存有银圆、黄金，所以折实公债收购大量的是银圆、黄金。在市推销委员会之下，以市商会原理事长温少鹤为商会公债推销委员会主任委员，迁川工厂联合会负责人李志亲为迁川工厂联合会主任委员。经过宣传动员，由胡子昂副主任委员约集市商会的各同业公会负责人和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负责人进行酝酿协商，进行数额的分配。这项工作由1950年1月到5月中旬基本完成290几万分的任务，遂宣布胜利折实公债结束。市人民政府因此掌握约300万硬通货，对稳定金融，稳定物价起到了有力的保证。

重庆工商联筹备成立

胜利折实公债结束后，公债推销委员会撤消。1950年6月，胡子昂接手重庆市工商联筹备工作，党和政府委任胡子昂为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李志亲、温少鹤为副主任委员，李仲平为秘书长，柯尧放、温仲六为副秘书长，樊恒才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徐伯图为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工商联的筹备工作开始以后，政治思想上接受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业务工作上接受工商局和市税务局的领导。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辅导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政策。

1950年6月起，我在辅导委员会做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党和政府解除工商业者的思想顾虑和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具体有以下两件事：

1. 办了一个工商学习班，辅导工商业者学习对私改造的方针政策，调解劳资纠纷。
2. 协助党和政府辅导工商业者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

由于新的人民政府是在打碎旧的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是在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后建立起来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因此，广大工商业者对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法令很不理解，当时党和政府除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兵工厂、大钢铁厂等官僚资本进行了接管，对私营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如民生公司等派驻军代表。

记得有一次童少生（民生公司副总经理）对我说，民生公司的军代表对他处理的某项业务提出了意见，问我该怎么办。我问他这一业务是否妥当，他说可能不妥当。我说：“共产党人讲求实

事求是，讲求批评与自我批评。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就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一个报告，作点批评，才能解决。”他把报告写好交我修改以后，向军代表谈清楚，军代表以赞扬和嘉许的态度认为这样作对事业、对共事关系都有好处，说自己也有不妥当的地方，也请童少生给他提意见。童少生事后对我说，我们资产阶级要放下面子、架子，实事求是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很有好处。

还有，当时各大中型企业都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如企业有关劳资关系协商不好时，就到工商联要求协商解决。如：聚兴诚银行杨受百因职工要求增加工资问题前来工商联要求调解。根据杨受百的陈述，当前业务不好除购买折实公债之外，不久还要赔退农民的减租退押资金，因此无法增加职工工资。我们当即对职工代表进行解释，认为聚行分支机构很多，如果重庆增加工资，各地分支机构势必都要要求解决；根据劳资两利政策，等业务好转以后，再来协商解决。职工代表接受我们的建议后，就不再坚持要求增加工资了。

开办工商学习班

由于劳资纠纷、税务政策、业务纠纷等不断前来工商联要求咨询和调解，为了使工商业者了解解放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我请准胡子昂主委同意组织工商界骨干分子如胡鼎泰、张钧陶等四十人在每周一、三、五晚上7—9时开办工商学习班。主要学习了以下几项内容：

1. 社会发展简史；
2. 第一次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
3. 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

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计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政治上非常软弱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由于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中立，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而我们更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

通过学习，大家又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就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联系又有斗争，既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应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

通过学习，认识到解放后的新中国要经过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要五种经济成份并存，即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并存。

解放后的重庆市，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烂摊子基础上接受过来的，虽然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兵工厂、钢铁厂、电厂、水厂等，但有关国计民生的轻工业、商业、服务行业等都是私营经济的比重占国营经济比重的百分之七八十。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方面，逐步实施社会主义改造。为了调动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党和政府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私营经济盈利后，一是上交国家的税收；二是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作为企业积累；三是发给企业职工奖金；四是发给资本家的私股股息和红利。并号召工商业者爱国守法，积极经营，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多作贡献。

党对工商业者在过渡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就是要求调动其积

极性。因为国营经济只接管了很少数的大厂，而且都是基础工业，人民生活必需品，国家一点都没掌握。轻工业、商业、服务业完全掌握在私营工商业者手上，虽然当时是五种经济并存，但公私合营、合作社都还没有搞起来。那时，私营经济还是国家掌握生产、经营的重点，所以，就采取了这些政策来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

按工商联筹委会的分工，辅导委员会所做的关于辅导工商业者学习政策，是搞好业务的任务。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改组旧同业公会。

旧政权变新政权，工商业者当然不理解。过去是资产阶级管工人，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过去是资产阶级说了算，现在是听党的领导，所以他们既不懂，也不习惯。

辅导工商业者接受土地改革运动

由于重庆解放较晚，未搞土地改革，所以农村土地改革必须补课。1950年下半年，重庆市郊区和各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场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工商业者中除迁川工厂的工商业者而外，本地的工商业者大都是从小农经济转化而为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多数工商业者都有土地问题。党和政府根据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原则，采取不同于地主阶级的办法来对待。

记得当时杨松青部长安排我担任工商界土地改革办公室主任，并调姚璧佩和李同志两干部协助办理。当时政府规定，凡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只要接受农民要求减租退押，交出土地所有权状归还农民的可以不下乡，除少数地主兼工商业者而外。重庆工商业者所有的资金大概分作三个部分：一是投资工厂和商店的资产；

二是原有和购买的土地和房地产，三是手头还有一部分流动资金。对土改赔退的资金不能从企业里抽走，因为有职工监督，而手头的流动资金除购买折实公债，所剩不多。为了帮助工商业者割掉地主这个尾巴，只有出卖一部分房地产来解决。我们根据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当即报告统战部，要求政府统战部门协助。如聚兴诚的杨受百、强华轮船公司的黄明安都由政府收购他们的房地产来解决的。

重庆市工商业者在土改中赔退农民的金额估计价值约等于现在的 1000 万元以上。

土改中，政府对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不令其下乡跟农民直接对面，而由农民进城找重庆市农民协会（设在人民公园旁），提出对地主的要求和意见。农协就通知工商联土改办公室，要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去向农协了解赔退多少钱，地契多少张，然后把钱和地契交到农协，由农协交给农民，这样避免了农民跟地主的直接接触。

地主兼工商业者下乡均要通过工商联土改办公室。地主兼工商业者主要以土地为主，对于工商业只是少数有一点股票，本身并不亲身经营工商业业务，这就是地主兼工商业者。工商业者兼地主是以工商业为主，土地为辅又直接经营工商业的，这部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地主阶级则属敌我矛盾，为打倒阶级。尽管工商业者对土改不甚满意，但因为未列入敌我矛盾而自慰，所以对赔退较积极，只想早点割掉地主尾巴。

参加物资交流会

1951 年全国除台湾外，还有西藏未解放，党和政府决定进军西藏，完成全国解放事业。

1951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仁川登陆，逼近鸭绿江边。党和政府决定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的战争。同时决定修建成渝铁路，实现满清末年兴办川汉铁路的夙愿。由于抗美援朝和进军西藏，重庆接管的兵工厂大力发展军工生产，从而带动私营煤矿业和其他机械铁作业的发展。又由于军用物资的需要，如棉纺业、西药业、以及军用胶鞋、军用饼干等大量需要，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大量的订货生产。成渝铁路修建所需的钢轨，重庆还不能大量生产，但修路所有工具和铁路的道钉等，都需重庆的机械工厂和铁作业进行大量的订货生产。

由于各种原因，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还不很畅通，党和政府为了搞活流通，要求各大城市开办物资交流会。记得1951年4月，北京、天津通知重庆工商界派代表参加两市物资交流会。一天，胡子昂主任委员通知我去见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财贸部长王磊。王部长说：重庆市派代表团参加北京、天津物资交流会，由财贸部一位专业公司经理任团长，拟派你为副团长。团长当时在上海工作，先由你组织代表团去北京，团长由上海前往参加。我通知与有关的行业协商组织了二三十人的代表团，自带行李，自筹出差旅费，自拿样品，不派干部，指定几个人办理事务和联络工作，坐船到武汉再转车到北京，被安排在前门大栅栏瑞蚨祥大商号楼上居住，并在全聚德餐馆包饭。经过四五天的业务洽谈，对重庆的地方产品，如皮鞋、肥皂、牙刷等，因四川出皮革、桐油、猪鬃等，比外地物美价廉，签订了一些协议合同。代表团并拜访北京市工商联，介绍了重庆的商品情况，希望北京市工商界大力支持，还谈到重庆市工商联与北京市工商联对共同所签合同协议，起到一定的监督保证作用。

经过四五天的物资交流会结束后，正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全

国工商联送来各地代表团正副团长参加天安门楼下观礼台观礼证。各地工商代表在长安街参观。5月1日上午9时至11点参观了工人农民解放军等几万人的浩浩荡荡五彩缤纷的大游行，最后是毛泽东主席走到天安门城楼东西侧高举帽子向群众致意。通过观礼和参观，代表团的全体代表无不感到高兴和自豪。

5月2日，重庆代表团又赴天津参加天津物资交流会，住在天津商号。经过三四天的业务洽谈后，便返北京沿武汉回重庆。

1951年下半年，重庆市同样举办了物资交流会，邀请了上海、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的代表团参加。重庆市代表团由工商局局长孙济世为团长，徐伯图为副团长，并邀请刘希贤为商品展览馆长，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重庆的商品。通过四五天的业务洽谈，重庆代表团对上海、广州、武汉购进多一些，售出的商品也不少，胜利的完成了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任务。

由于党和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再加上广大贫下中农通过土地改革，减租退押，手中有多余资金，增加了购买力，因而1951年的国民经济形势，不仅恢复而且有了一定的发展。重庆广大工商业者，根据四马分肥的原则，有利可图。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最初工商界疑虑甚多，深恐打不赢美帝国主义。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团结合作，不怕牺牲，英勇善战，打退了美帝的进攻，并逐步恢复被占领土。党和政府邀请重庆工商界的代表人士王文彬、陈叔敬等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并回来传达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如黄继光、邱少云等，大家很受鼓舞。党和政府号召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重庆工商界完成了50架战斗机任务。

四川人民渴望几十年修筑川汉铁路的愿望，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沿线农民以工代赈，成千上万地参加沿线土石方工作

的支持下，使成渝铁路胜利动工修建。

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动以后，重庆工商业者也有人乘机抬高物价，如京京西药店在宣布抗美援朝后，立即将西药提高一倍价钱，受到逮捕法办的处理。

五 反 运 动

1952年初，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党和政府决定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在党政机关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不断发生私商和蜕化变质分子相互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甚至有的机关干部被不法资本家收买、拉拢。就是一部分人被拉出去，一部分人打进来。虽然解放后，党和政府提出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但解放三年来，工商界并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尤其是在解放后的恢复发展阶段，广大工商业者仍然按照解放以前的投机倒把、唯利是图的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在做，还没有受过严重的批评和斗争的教育。而这次的五反运动是对不法资本家的一次严重的阶级斗争，它不仅是一场经济斗争，也是一场移风易俗的政治斗争。因此，在广泛发动工人阶级检举揭发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时，不少工商业者震动很大，尤其是通过小组斗争、大会揭发批判斗争和逮捕等，使有的不法资本家畏罪自杀。

为了避免过火的斗争方式，党和政府将这种面对面的斗争改为背靠背的斗争，在大体上做到了斗而不乱，避免了前阶段发生的偏差。由于党和政府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

号召，不少工商业者在打虎队的揭发批判中，就采取丢包袱的想法，破罐破摔的态度，比着所有资本的数额交待一些违法活动；有的逼供信方面也揭发别人一些问题，因此，在最后定案时，造成很多混乱。最后，党和政府对工商户的处理，要求掌握“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如补税一般只补 1951 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倒把商业从严的原则。划分工商业的类型为五类：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户为多数，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为少数。在赔退补税的问题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即现行退补一部分，退不出的一部分作为公股，其余的部分分期偿还。

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

五反运动确实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但也带来一些后遗症。主要是工人失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资本家不敢负责，普遍惶惶不安，感到退补的金额过重，对今后的经营无所适从。党和政府为使资本家重新靠拢，在新的基础上调整了工商业，党和政府又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违法和不违法的界线。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五反运动不是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改变，而是对资产阶级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为进行斗争。不是消灭资产阶级，仍然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因此，在五反运动结束时，党和政府采取调整工商业的政策，主要是降低银行利率，增加放款，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产品。随后在商业方面主要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如提高加工订货的工缴费，扩大批零差价，使私营工商业有利可图。由于党和政府适时调整工商业，1953 年私营工商业在五反后，获得恢复和发展。有些企业利润成倍增加。正

如一般工商业者所说：“这是难忘的 1953 年”。

党和政府为了使资本家重新靠拢，关键是实事求是的在对一些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时，敢于把计算过高的资本家违法所得降下来。在定案中，不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办法，而且允许资本家申诉和进行复查。如在五反运动中有人揭发杨受百对别人进行过行贿问题，他背包袱，杨部长就找他谈话，说聚兴诚银行在人民银行管理之下，你找余跃泽行长说清楚，要实事求是的处理，因此如童少生、杨受百、陈叔敬都定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由于工作做得比较稳妥，资本家也比较满意。又如刘伊凡经营肠衣猪鬃业，解放后进出口业务一般都停顿了，由国家统一管理，虽然他赔退了四五万元（现值）赃款，党和政府实事求是的退还了他。而刘伊凡感到今后对外贸易工作私人无法经营，他决定将全部所退赃款作为捐献抗美援朝的捐款，受到党和政府的表扬，随后他被工商界推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并当选为全联执委。

由于广大工商业者接受了五反运动的教育，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企业纷纷争取公私合营的申请，如重庆宝元通公司全部企业的财产作价卖给国家，全部职工转为国营企业的职工。宝元通的总经理黄凉尘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商业部副部长、兼宝元通副总经理，樊陶斋安排为西南百货公司的经理。民生实业轮船公司争取公私合营，把民生公司的定息定为 8 厘，重庆各银行钱庄也进行了公私合营。

党和政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4 年 9 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 1949 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全国人大把党在